

杨简《慈湖春秋解》及其与陆九渊之异同

黄觉弘¹

【摘要】除《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外，《慈湖先生遗书》中还有一些《春秋》学专论。《慈湖春秋解》的内容、思想和解说方式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如出一辙，具有高度一致性。《慈湖春秋解》的核心宗旨，一言以蔽之，即认为《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此论不仅仅为《春秋》所发，其实是杨简对群经宗旨的纲领性论断。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并没有真正表现出陆九渊的自身学术特色，杨简《慈湖春秋解》则带有很显著的个人心学烙印。《慈湖春秋解》是今存象山学派中仅见的《春秋》全经注解之作，解决了象山学派的《春秋》阐释问题，无疑为此派代表性著作，弥足珍贵。

【关键词】 杨简 《慈湖春秋解》 明道 心学 陆九渊

一、关于杨简《春秋》学著述

杨简（1141—1226），字敬仲，明州慈溪（今属浙江）人。孝宗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卒谥文元，世称慈湖先生。其生平可见钱时《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宋史》卷四〇七本传以及清冯可镛《慈湖先生年谱》等。杨简师事陆九渊（1139—1193），是象山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与袁燮、舒璘、沈焕合称“淳熙四先生”“甬上四先生”。

杨简是象山门人中著述最为宏富者，近人张寿镛《慈湖著述考》通考杨简著述凡有三十种，其中“已见各书为十五种，未见各书为十五种，较《慈溪志》所列多六种，然间有重复者”¹。2015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董平校点的《杨简全集》（全十册），收有《杨氏易传》二十卷、《五诂解》四卷、《慈湖诗传》二十卷、《石鱼偶记》一卷、《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先圣大训》六卷、《慈湖先生遗书》二十五卷等。

杨简博涉多通，兼综群经。钱时《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云：“（简）筑室德润湖上，更名慈湖。馆四方学子于‘熙光’、‘咏春’之间而启迪之，于是始传《诗》、《易》、《春秋》，传《曾子》，始取先圣大训间见诸杂说中者，刊讹剔诬，萃六卷，而为之解。”¹可知杨简撰有多种传解。

今学者研究杨简其人其学，已对杨简诸经之学如《易》学、《诗》学、《书》学等多有专题探究，但对杨简亦颇用心心的《春秋》学则付阙如。这主要是因为杨简的《春秋》学专著《春秋解》长期以来流传不广，不如《杨氏易传》《慈湖诗传》通行，学者罕睹其书，因此形成杨简研究中的一大缺憾。《宋史》卷四〇七本传没有言及《春秋解》，《宋史》卷二〇二云：“杨简《春秋解》十卷。”²《授经图义例》卷一六云：“《春秋解》十卷（杨简）。 ”³

杨简《春秋解》于永乐初抄入《永乐大典》，引称“慈湖杨简传”。后来《天启慈溪县志》卷七叙杨简著述：“有《诗》《易》《春秋》《论语》《孝经》传、《古文孔子闲居解》，又著《己易》，辑《先圣大训》。”⁴可知杨简《春秋解》亦称《春秋传》。但此书后世传本罕见，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孙能传等《内阁藏书目录》皆不著录，可见至万历年间内阁藏书即不获睹，或当时已亡佚失传。《经义考》卷一八八著录此书，亦注曰：“未见。”⁵张寿镛《慈湖著述考》云：

寿镛谨案：《慈溪艺文志》录先生著述都二十四种。……《春秋解》十卷，案《经义考》载《春秋解》十卷，注云‘未见’，

¹作者简介：黄觉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伊洛《春秋》学研究”（15BZS013）阶段性成果

复载《春王正月说》一篇、《季札观乐》一篇、《公至自棠论》⁶一篇、《许世子弑君说》一篇，此四篇皆在《遗书》中，《慈志》谓疑即《春秋解》之文。惟寿镛以为《春秋解》凡十卷，先生既自作序，世必有流传之本，此尤宜访求者也。¹

张寿镛《慈湖著述考》并于“未见各书”中首先著录“《春秋解》十卷”¹。张寿镛推断《春秋解》“世必有流传之本”是正确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卷三春秋类著录：“《慈湖春秋传》十二卷，宋杨简撰。清郑氏注韩居抄本。”⁷此抄本今藏重庆图书馆古籍部，笔者曾考证此本实为《永乐大典》辑佚本。⁸

也就是说，此本由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重传于世，杨简《春秋解》可谓失而复得。但由于此本长期作为善本藏于重庆图书馆，学者获睹不易，故多以为亡佚不传，如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即曾说：“杨简所著经传，现存只有《杨氏易传》二十卷和《慈湖诗传》二十卷。《宋史·艺文志》所录《春秋解》十卷已佚，《慈湖遗书》中尚存《春秋解序》一篇。”⁹因此该书在论述杨简经传时，只分析了《杨氏易传》和《慈湖诗传》。2015年董平点校重庆图书馆藏《慈湖春秋传》，并改题《慈湖春秋解》，收入《杨简全集》第四册出版，方流传渐广。

除《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外，《慈湖先生遗书》中还有一些《春秋》学专论，如卷二《深明阁记》《著庭记》，比较集中的是卷九《家记三·论春秋》。《家记三·论春秋》本有八则，但第七则乃就《庄子·人间世》所载孔子言“天下有大戒二”¹⁰一节通论忠孝文义，与《春秋》经传并无关系，当为《家记》编者误入，原文或当在卷一四《家记八·论诸子》之中。因此《家记三·论春秋》所载《春秋》专论实有七则，《经义考》卷二一〇曾著录杨简《春王正月说》¹¹、《公至自唐论》、《季札观乐说》、《许世子弑君说》四篇，即出于其中四则。不过《经义考》所录四篇篇题乃朱彝尊自拟，《家记三·论春秋》原文中并无。

这七则《春秋》专论都出于《海语》，《海语》乃曾汲古所编杨简平时讲学的记录。张寿镛《慈湖著述考》引《征文录》云：“慈湖又有《海语》一书，曾汲古编，与《家记》大意相同。”¹王梓材《慈湖弟子从祀记》云：“曾汲古，字子潜，庐陵人。”¹《慈湖先生遗书》提及曾汲古次数甚多，凡百余见，但《宋元学案》卷七四《慈湖学案》之“慈湖弟子”竟不录之，殊为缺漏。

后来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卷七四《慈湖学案补遗》辑补有“曾先生汲古”¹²。《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六曾推说《春王正月说》等四篇，“皆在《慈湖遗书》中，疑即《春秋解》中之文”¹³，这一推测是不准确的，前引张寿镛《慈湖著述考》已有辨正。不过，这四篇专论原出于《海语》，乃曾汲古所记杨简平时教诲之语及师生答问，其内容则确实多可与《慈湖春秋解》的有关经解相参证。如《春王正月说》（即《家记三·论春秋》第六则）云：

汲古问：“《春秋经》有书王正月，有不书王正月，此是略阙文否？”先生曰：“十一公之元年，皆书王正月，唯桓公三年而后不书王，定公元年不书正月而书王三月。”汲古云：“未达其义。”先生曰：“不书者，非脱阙也，孔子削之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即此类也。盖《春秋》法甚严，而亦甚宽。鲁桓弑君，周王当诛之，至三年而王不能诛，始不书王。鲁昭公之见逐于三家，逐虽轻于弑，而既七年矣，故定公元年不书王正月，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讨之。”¹

而《慈湖春秋解》卷一一定公“元年春王”条，云：

十一公之元年，皆书王正月，唯定公元年不书，何也？《春秋》虽甚严，而亦甚宽。鲁桓杀君，天王当讨之，至三年而王不能诛，始不书王。鲁昭公之见逐于三家，逐虽轻于弑，而既七年矣，故定公元年不书王正月，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讨之也。¹

《慈湖春秋解》卷二桓公“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条，云：

自此并不书王，非脱阙也，孔子削之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谓此类也。……厥后他国之弑亦多，亦书王者，圣人已明其旨于此，不欲数数也。¹

可见,《慈湖春秋解》这两条经解的划线部分缀合起来即《春王正月说》全篇内容,文辞也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作为经解,《慈湖春秋解》较《家记三·论春秋》所记问答更为详实严谨、系统全面,也不用对话体。又《许世子弑君说》(即《家记三·论春秋》第八则)¹文辞也几乎全见于《慈湖春秋解》卷一〇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¹条经解。

《公至自唐论》(即《家记三·论春秋》第一则)¹与《慈湖春秋解》卷二桓公二年“公至自唐”条经解¹侧重不一,差别较大,但文辞亦时有同者,二者可相互补充。《季札观乐说》(即《家记三·论春秋》第四则)¹内容文辞也当见于《慈湖春秋解》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条经解,只是《慈湖春秋解》乃系《永乐大典》辑佚本,其中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至僖公三十三年末,襄公十六年“齐侯伐我北鄙”至襄公三十一年末,合三十五年经传皆阙,“吴子使札来聘”经传恰在此阙之中,今已无从比较矣。

二、《慈湖春秋解》之“明道之书”论

杨简《慈湖春秋解》虽然自出机杼,别成一家,但其征引经史子书亦广,特别是征引《春秋》三传及名家注解甚多,或引以为据,或指正批评,或发挥申论,可知《慈湖春秋解》也是在前代既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并非闭门造车。需要指出的是,今本《慈湖春秋解》除了正文中的征引外,还有随处可见诸多小字注文中的“左氏曰见前”“公羊曰见前”“穀梁曰见前”“何休云见前何休注”“杜预曰见前杜预注”“赵子曰见前陆淳辨疑”“胡康侯曰见前胡安国传”等之类,这些小字注并非杨简《慈湖春秋解》原本如此,而是保留了《永乐大典》的抄纂原貌。所谓“见前”,是因为征引的著作内容在《永乐大典》前文已有抄录,故抄纂者省略其文并特加标注以避重复累赘。也就是说,如果恢复这些省略了的“见前”的引文,以及阙佚的僖公、襄公合三十五年经传,《慈湖春秋解》原本篇幅较今本要大些。今本字数甫及八万,原本估计当近十万。

就《慈湖春秋解》来看,杨简延续了中唐啖助、赵匡以来,历北宋而形成的“舍传求经”“不惑传注”的新学风,整个注解比较简明,不重训诂而重义理,平视三传及诸家注说,不盲从不专主任何一家,而是贯通三传及诸家注说,或择善而从,或辨诬析疑,或出以己意,取舍是非皆由自裁。

杨简于三传及诸家注说屡有驳正之言。如卷二桓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袤,伐郑”条,云:“《左氏》无一语著其罪,《穀梁》亦然。《春秋》之旨昭然,而诸儒犹疑,意乱虑多而昏也。”¹卷六文公三年“雨螽于宋”条,杨简称引三传之说,云:“传闻异辞,然皆不言国政不顺所致,皆失圣人之旨。”¹有时批评不假辞色,甚为严厉。

如卷一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条,云:“左氏之妄多矣!……左氏谬妄至于此极。”¹卷二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执郑祭仲,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条,云:“《公羊》思不及此,遂以祭仲为知权。呜呼,公羊亦篡夺之徒已!”¹卷一二哀公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条,云:“而《穀梁》乃为尊王父之说,明辄之无罪。甚矣,夫邪说之害正也!”¹

杨简对于本朝学者如孙复、程颐、胡安国等也别有关注,尤其对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征引多达二十条,大体上是有取有弃有补充。取者如卷二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条,即据“程子曰‘不书败,诸侯不可敌王也’”¹来解释。卷二桓公三年“有年”条,云:“胡康侯曰:‘桓、宣享国十有八年,独此二年书,则他年之歉可知矣。’其天理不差,亦信。”¹

弃者如卷七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条,云:“《左氏》贬其不实言,胡康侯亦著其叛盟为恶,恐非《春秋》之旨。”¹补充者如卷六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颀”条,云:“胡氏能言《春秋》之义之名,未言夫《春秋》之义之实,近在人心,不劳外索。”¹

这充分说明杨简吸收了本朝《春秋》学成果,受到本朝《春秋》学者尤其是胡安国的影响。胡安国《春秋传序》认为《春秋》“乃史外传心之要典”,“此书遇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¹⁴。应该说,胡安国延续程颐《春秋传》的诠释路向,将《春秋》学理学化的解经方式对杨简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杨简认为“天下无二道”，包括《春秋》在内的六经皆为一体，其旨一以贯之。《慈湖先生遗书》卷一《春秋解序》云：

某敬惟《易》、《诗》、《书》、《礼》、《乐》、《春秋》，一也。天下无二道，六经安得有二旨？……故孔子曰：“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不乱者，不睹其为纷纷，一以贯之也。《春秋》之不乱，即《诗》之不愚，即《书》之不诬，即《乐》之不奢，《易》之不贼，《礼》之不烦也，一也。孔子继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圣言至矣！¹

这和《慈湖春秋解》卷一二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条所云“不惟《春秋》之旨如是也，六经之旨，皆如是也，一也”¹，以及《慈湖先生遗书》卷一《诗解序》所云“《易》、《诗》、《书》、《礼》、《乐》、《春秋》，其文则六，其道则一，故曰‘吾道一以贯之’”¹的论述是一致的。而“天有四时，春秋冬夏”云云一节，原出于《礼记·孔子闲居》，不仅《慈湖春秋解》卷六文公七年“冬，徐伐莒”条¹、卷一二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条¹有引述，《慈湖先生遗书》卷二《咏春堂记》、《磬斋记》、《深明阁记》、《著庭记》、《赠钱诚甫》、卷九《家记三》、卷一一《家记五》、卷一四《家记八》等篇以及《杨氏易传》《先圣大训》也屡屡称述，是杨简证明“道”之普适、无所不在和六经之旨一以贯之的重要根据。

杨简“六经之旨，皆如是也，一也”的不断证明，即是以其道（心）学理念观照群经，通过对群经的诠释，赋予群经道（心）学色彩，实践由“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转换，完成自己心（道）学体系的构建。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曾分析《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内容和思想，认为二书“都是杨简的心学基本观点在疏解儒家经典时的具体发挥，都是陆九渊‘六经注我’的具体实践”⁹。而《慈湖春秋解》的内容、思想和解说方式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如出一辙，具有高度一致性，也是以心学理念诠释《春秋》，将《春秋》心学化。

杨简《慈湖春秋解》的核心宗旨，一言以蔽之，即认为《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明道”之语前人本有陈说，董仲舒劝谏江都王刘非，云：“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¹⁵后来朱熹借用董仲舒此言来说《春秋》，云：“《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都晦了。”¹⁶又云：“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¹⁶

但董仲舒、朱熹皆就义利之辨着眼，且一语提过，没有赋予“明道正谊”更多意义。朱熹遍注群经，然不及《春秋》。杨简则以“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的理念贯彻《春秋》全经，以“心”释“道”，赋予了“明道”说崭新而特别的意义。通观《慈湖春秋解》，“道”“心”“人心”“道心”“明道”等关键词比比皆是，其中“明道”凡70见，“人心”凡75见，“道心”凡35见，“本心”凡20见。

全书核心宗旨的表述，“明道之书”凡15见，“人心即道”凡7见，可见杨简屡屡致意，反复强调。《慈湖春秋解》卷一开篇释“隐公”，即倡言“《春秋》于是乎明道”¹。经首“元年春王正月”条，云“孔子因鲁史以明道”¹。卷二桓公三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条，云：

圣人于春秋昏迷纷乱中发明本心之善，所以明道也。人心自善，人心即道，故《书》曰道心。意动而昏，始邪始乱。圣人于人心昏乱扰扰之中忽睹本善之发露，故急之以明其即道。而《公》、《穀》以近为言，是不知道。甚不可也！¹

卷二桓公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郑”条，云：

春秋君臣习乱习恶，肆行党逆，不以为异，大抵皆篡弑之徒。而鲁桓身弑其君，大恶滔天，而其善性终不泯，即见于至庙一节。圣笔如天地造化，讨其弑君之罪，至终其身，至其一节之善，亦不泯弃。是是非非，非者非道，是者是道。故曰：《春秋》明道之书也。¹

对于《春秋》“明道”的内容、方法和特点,《慈湖春秋解》论述甚多,不胜枚举。如卷八成公三年“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孙良夫盟”条,云:“信者,道之心;礼者,道之节。故曰:《春秋》者,明道之书也。礼、信乃道之异名。”¹指出《春秋》所明之“道”的具体内容。

卷一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条,云:“大抵春秋诸侯习乱,不有王室,孔子直书以明道。”¹卷二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齐”条,云:“《春秋》随事明道,故亦书。”¹卷一〇昭公十七年“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陆渾之戎”条,云:“《春秋》明道,无一定之论,随宜发明。”¹指出《春秋》“明道”采用“直书”“随事”等“无一定之论,随宜发明”的方法。

卷五僖公九年“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条,云:“《春秋》明道,不以是掩非。是者是道,非者非道。”¹卷一〇昭公二十八年“公如晋,次于乾侯”条,云:“而《春秋》必书以著其非者,明道也。道无大小,无详略,无非道者。是故《春秋》无所不明也。”¹指出《春秋》“明道”唯道是存、无所区分的特点。

对于“明道之书”“人心即道”的这种落实,显现出杨简浓郁的心学特色。《慈湖春秋解》卷二桓公二年“公至自唐”条,云:

夫桓,弑君之贼,大恶滔天,孔子何取乎斯也?呜呼至哉!孔子灼知人性自善,人心即道,故曰道心。意动而昏、始乱始悖。虽大肆其害,性终不磨灭。故孔子于鲁桓书至,书其礼也。难者曰:既已弑君矣,何礼之有?应之曰:善恶不相掩。弑君之恶自可诛戮,至庙之礼终不为非。非者非道,是者是道,是无两是,道无两途。何深何浅?何精何粗?孔子于春秋大乱之中发明大道,至易至简。人所自有,不假于他求,息其纷动之意,则人性自善自正,自清明,自广大,不索而自获。学者不省,舍近而求远,舍其所自有而求其所无。¹

“道心”即宇宙之本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无所不通之道心”¹,不假外物而存在,乃人所自有,未始间断,至灵至神,本来自善自正,但世上之所以各种妄行逆施层出不穷,是由于“意动而昏”,本心受到玷污蒙蔽,遂至于迷乱逆邪,“虽昏虽乱,而本心之灵,终不磨灭”¹。《春秋》即随事随宜而“发明大道”,去弊解惑,发露恢复其本心。卷一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郕;庚寅,我入郕”条,云:“孔子举而书之,而天下是非之心自明矣。盖人心自灵,人心自明。私欲如尘,本心如鉴。孔子以一二语出其本有之光明,夫熟而昭然。人心即道。”¹

这种诠释在杨简其他著述里也屡屡出现。如《先圣大训》卷四《乐山》云:“孔子因鲁《春秋》笔削成书,凡以明道而已矣。……盖大道,人心之所自有,人心即道,故《书》曰道心。动乎意而失其正,为昏为乱。《春秋》不作,则天下后世尽胥而为夷狄禽兽矣。”¹《慈湖先生遗书》卷九《家记三·论春秋》第二则亦云:“《春秋》为明道而作,所以使天下后世知是者是道,非者非道。而诸儒作传,不胜异说。或以为尊王贱霸,或以为谨华夷之辨,或以为正名分,或以为诛心。”

凡此固《春秋》所有,然皆指其一端,大旨终不明白。”¹这充分表明,《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这一论述,是杨简整个《春秋》学的核心理念。不特此也,《春秋》学之外,杨简其他著述如《杨氏易传》《慈湖诗传》《五诰解》《先圣大训》等亦有相同阐释。如《杨氏易传》卷一《乾》云:“卜筮者,民之利用,圣人系之辞,因明人之道心,是谓正德。人心即道,故舜曰道心。”¹

《慈湖诗传》卷六《将仲子》云:“人心本善本正,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因物有迁,意动而昏,始乱始杂,然其本心之正,亦间见互出于日用云为之间。三百篇多此类……圣人无私善,无私怒,平心是非,皆以明道,不以是掩非,不以非掩是。”¹《五诰解》卷三《召诰》云:“人心即道心,惟放逸则失之。以敬治道心,为治之大。”¹这些不同著述的相同阐释,正是杨简“六经之旨,皆如是也,一也”的体现。

由上可见,《慈湖春秋解》论“明道之书”,论“人心即道”,皆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五诂解》《先圣大训》《慈湖先生遗书》等著述一一相合。也即是说,“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论,不仅仅为《春秋》所发,其实是杨简对群经宗旨的纲领性论断。

三、杨简《春秋》学与陆九渊之异同

杨简作为陆九渊门下高弟,思想学说深受其师影响。陆九渊思力独绝,重视践履,亦善讲学,弟子云集,但却不好著述,认为传注、章句之类不过是“支离事业”,“今之学者读书,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¹⁷,“真柳子厚所谓独遗好事者藻绘,以矜世取誉而已”¹⁷,故而反对“用心于枝叶”¹⁷。其《与侄孙潜》云:“若其气质之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窃傅会,蠹食蛆长于经传文字之间者,何可胜道?”¹⁷因此,陆九渊虽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¹⁷、“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¹⁷的高明深刻之论,却最终没有全文注解过任何一经。其实,注经解经是阐释论证自己思想理论的绝好途径,甚至在传统学术中,通过“我注六经”,从而达到“六经注我”“六经皆我注脚”的目的,实现自我理论验证和学术传播的必要方式。所谓“好事者藻绘”“蠹食蛆长”云云,实属陆九渊过偏过激之论。不过,陆九渊曾对《春秋》经传注说多所用心,如答弟子问读六经注解之法时,云:“须先精看古注,如读《左传》则杜预注不可不精看。大概先须理会文义分明,则读之其理自明白。”¹⁷又曾说:“尝阅《春秋纂例》,谓学者曰:啖、赵说得有好处,故人谓啖、赵有功于《春秋》。”¹⁷陆九渊有《大学春秋讲义》一卷,凡四篇,分别是淳熙九年(1182年)八月,淳熙十年(1183年)二月、七月、十月陆九渊在太学时的四次讲义,内容是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至宣公十年“楚子伐郑”的经解,合计二十四条。这是陆九渊今存最为集中和比较系统的《春秋》论说。此外,还有一些论及《春秋》的零散语录。

整体上看,陆九渊对历代《春秋》传注都不太满意,认为“《春秋》之亡久矣,说《春秋》之缪,尤甚于诸经也”,“后世之论《春秋》者,多如法令,非圣人之旨也”¹⁷。《政之宽猛孰先论》还批评《左传》说:“左氏之传经,说《春秋》者病其失之诬,柳宗元非其《国语》,以为‘用文锦覆陷阱’。彼其宽猛之说,其为诬而设陷阱也大矣。左氏不足道也。”¹⁷但传统《春秋》学所宣扬的“微言大义”还是深深地影响了陆九渊的思想和行为。陆九渊说:“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讎,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今吾人高居无事,优游以食,亦可为耻,乃怀安非怀义也。”¹⁷这种“知中国夷狄之辨”、报国复仇的志向和情怀,可与《宋史·儒林传》所载“九渊少闻靖康间事,慨然有感于复仇之义”²相印证,也可与《大学春秋讲义》相印证。《大学春秋讲义》申言“中国夷狄之辨”、夷夏之防的有好几条。如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条,云:

圣人贵中国,贱夷狄,非私中国也。中国得天地中和之气,固礼义之所在。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虽更衰乱,先王之典刑犹存,流风遗俗,未尽泯然也。夷狄盛强,吞并小国,将乘其气力以凭陵诸夏,是礼义将无所措矣,此圣人之大忧也。

¹⁷

又宣公九年“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会于扈,晋荀林父帅师伐陈”条,云:“然圣人之情,常拳拳有望于晋,非私之也。华夷之辨当如是也。”¹⁷此外,宣公八年“楚师伐陈”条,宣公九年“楚子伐郑,晋郤缺帅师救郑”条,宣公十年“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条,“楚子伐郑”条,皆申言《春秋》“贵中国,贱夷狄”“贵晋而贱楚”之义。陆九渊反复着意于此,说的是春秋时事,但浸透出来的则是“二圣之讎,岂可不复”的深沉现实感喟。

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二十四条,杨简《慈湖春秋解》相应无说者七条,有说者十七条。此外,陆九渊语录中曾论及庄公十三年春的“北杏之会”,《慈湖春秋解》亦有相应解说。今比较杨简与陆九渊二说异同,可以得知:

其一,《慈湖春秋解》曾引述《大学春秋讲义》。《慈湖春秋解》卷七宣公十年“冬,公孙归父如齐,齐侯使国佐来聘”条,有云:“宣公是年,身如齐者二,使其臣如齐者三。”¹“宣公是年”三句凡十六字,文辞全同于《大学春秋讲义》本条解说。¹⁷这可证实杨简曾参考《大学春秋讲义》,故引述及此。

其二,《慈湖春秋解》一般较《大学春秋讲义》相对简要,这可能与著述体例有关。《大学春秋讲义》既为讲义,往往引据稍繁,论述较多,不惮辞费。《慈湖春秋解》则解经之体,较为严谨审练。在可资比较的十七条中,有十一条杨简解说文辞都较为简要。如宣公十年“六月,宋师伐滕”条,陆九渊先是比较宋、滕二国大小强弱,指出“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耳”,继而分析批评“左氏谓滕人恃晋而不事宋”之说,确认“去年因其丧而围之,今年又兴师而伐之,其为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最后指斥宋“牟牟焉兴师伐滕,以逞所欲,尚得为有人心者乎?”¹⁷通条文辞凡一百六十余字。而杨简云:“夫滕之不事宋,小节也,且犹有丧。比岁加兵,宋之不德可知也。”¹解说大旨与陆九渊相同,但仅二十余字,极为简要。

其三,杨简解说与陆九渊大旨多同,有时更进一层,有时侧重不一,可相互补充。如宣公九年“秋,取根牟”条,陆九渊云:“鲁侯之志,犹齐侯也。”¹⁷指责鲁宣公与同年伐莱的齐惠公一样,恃强凌弱。杨简则云:“伐杀人多,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多杀家人,罪当如何?取非其有,盗贼之行。”¹他更加严厉地指斥鲁宣公杀伐之罪乃“盗贼之行”。再如宣公十年“饥”条,陆九渊云:“岁之饥穰,百姓之命系焉,天下之事孰重于此。《春秋》书饥盖始于是。圣人之意,岂特以责鲁之君哉?”¹⁷强调圣人之意以民为重。杨简则云:“饥,国之大灾也,百姓之命系焉。《春秋》书之,所以重民命,明无道以致灾厉。孔子曰:‘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¹可见,杨简在“重民命”之后,又补充强调了饥荒产生的因由,“明无道以致灾厉”,较陆九渊有进一步发挥。当然,杨、陆二说亦有不同者。如陆九渊语录有云:“《春秋》北杏之会,独于齐桓公称爵,盖当时倡斯义者,惟桓公、管仲二人。《春秋》于诸国称人,责之也。”¹⁷按北杏之会见庄公十三年春,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会于北杏。陆九渊认为齐桓公称爵,而诸国称人,是贬责诸国没有共同倡和盟会。《慈湖春秋解》卷三则云:“《穀梁》曰:‘是齐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桓非受命之伯也。举人,众之辞也。’明其众服之也。……春秋之时,上无明王,下无方伯,有齐桓者出焉,知尊周修政,以匡诸侯,以休息斯民,人心归焉。人之所与,即天之所与,即孔子之所与。”¹杨简赞同《穀梁传》的解释,认为诸国之所以称“人”而不称爵,乃在于诸国“众服之也”,是“人心归焉”的结果,《春秋》并无贬责之意,这显然与陆九渊“责之”说不同。

其四,总体来看,《大学春秋讲义》往往就事论事,仍然延续着汉唐以来《春秋》学旧有的阐释理论和方法,其所论中外华夷之防、上下君臣之别、天人相感、尊王攘夷、崇礼重民、义利之辨等都是《春秋》学史上的习闻常谈。唯宣公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齐;公至自齐;夏,仲孙蔑如京师”条,解说略具心学风格。陆九渊详考诸侯朝聘聘问礼制,认为此等朝聘之礼,“义之所在,非由外铄,根诸人心,达之天下,先王为之节文,著为典训,苟不狂惑,其谁能渝之?”¹⁷这个“非由外铄,根诸人心”的论述,稍可与陆九渊得自孟子的“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¹⁷的“本心”相印证。也就是说,《大学春秋讲义》并没有真正表现出陆九渊的自身学术特色。这或许是由于现存经解数量较少,尚不足以展现其特色。但更可能的或许是陆九渊对《春秋》的思考和诠释尚未成熟,还不能够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周洽圆融地贯彻到《春秋》解说中,达到“苟知其本,六经皆我脚脚”的境界。杨简《慈湖春秋解》则以《春秋》乃“明道之书也”,而“人心即道”的理念贯彻全经,带有很显著的个人心学烙印。更重要的是,《慈湖春秋解》十二卷虽然比较简约,但它是今存象山学派中仅见的《春秋》全经注解之作,解决了象山学派的《春秋》阐释问题,无疑为此派代表性著作,弥足珍贵。

陆九渊不好著述,视传注、章句为“枝叶”“蠹食蛆长”的过偏认知和倾向,深深影响了门下弟子,以致造成陆门弟子大都不好著述,普遍轻忽经注经解的局面。陆门弟子众多,《宋元学案》卷五八《象山学案》之“象山门人”即列杨简、袁燮、舒璘、傅梦泉等二十人,此外“又六十一人并见《槐堂诸儒学案》”¹⁸。陆门弟子虽綦繁,但学问则率多疏浅,著述寥寥无几。朱熹曾批评说:“金溪之徒不事讲学,只将个心来作弄,胡撞乱撞。”¹⁶黄百家亦说:“盖慈湖之下,大抵尽入于禅,士以不读书为学,源远流分,其所以传陆子者,乃其所以失陆子也。”¹⁸通考陆门弟子,就《春秋》学而言,杨简之外,精通《春秋》学者很少,撰有《春秋》学专著的就更少了,仅袁燮、邹斌、晁百谈等人稍精于斯学。袁燮字和叔,鄞县人,学者称絜斋先生,《宋元学案》卷七五立有《絜斋学案》。他著有《絜斋集》,其中如《论修战守札子》、《策问·历象一》、《策问·礼仪》引及《春秋》经传,但无《春秋》专论。邹斌字俊甫,临川人,学者称南堂先生,见《宋元学案》卷七七《槐堂诸儒学案》。他著有《南堂稿》,娴于《春秋》经传,且能以之经世致用,“先生以《春秋》诛心之法”¹⁸决讼平狱。但不见《春秋》学专著。晁百谈字符默,临川人,见《宋元学案》卷七七《槐堂诸儒学案》,著有《带川集》,“深于《春秋》”¹⁸,但亦不见《春秋》学著述。此外,还有陆九渊之子陆持之(字伯微)著有《诸经杂说》,章节夫“著书数十万言,皆发明诸经之旨”¹⁸,既言“诸经”,其中或涉及《春秋》,然今

已不可考矣。

杨简思想学说虽然深受陆九渊影响，但特立独行，博学宏识，生平讲学不辍，勤于笔耕，尤好著述，在陆门众多弟子中确实别具一格。杨简对于陆九渊视为“蠹食蛆长”的传注章句，也概不轻忽，甚至特意“用心于枝叶”，不仅对《周易》《诗经》《春秋》都作了全经注解，有《杨氏易传》《慈湖诗传》《慈湖春秋解》传行于世，并且对《尚书》《论语》《孟子》《礼记》等经也都有较为系统的阐释和论说。杨简遍注群经，充分实践了陆九渊“六经皆我注脚”的解经方法，以“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为宗旨，将心学理念贯彻于群经的注解诠释之中，融群经于心学，将经学心学化，实际上完成了陆九渊没能完成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豪言壮语。

注释：

1(2)(8)(9)(15)(16)(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7)(38)(39)(40)(41)(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79)(82)(84)(86)(88) 杨简：《杨简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7、2284、2515~2516、2525、2516、2501、2035~2036、1300、1036、2036~2037、1280~1281、2033~2034、1034~1035、2035、1054、1133、1011、1047、1326、1040、1038、1181、1127、1844、1346、1845、1140、1346、1003、1004、1036~1037、1054~1055、1198、1023、1038、1278、1117、1293、1035、1281、1075、1022、1613、2034、13、558、396、1177、1176、1173、1177~1178、1074~1075页。

2(3)(76)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064、12880页。

3(4)朱睦㮮：《授经图义例》，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3页。

4(5)姚宗文纂修：《天启慈溪县志》，载《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38页。

5(6)朱彝尊：《经义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65页。

6(7)按，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一〇著录“棠”原作“唐”，不误，《光绪慈溪县志》卷四六所引误。

7(10)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页。

8(11)参见拙文《重庆图书馆藏郑氏注韩居抄本〈慈湖春秋传〉考说》，《文献》2019年第6期。

9(12)(42)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4、598页。

10(13)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5页。

11(14)按，朱彝尊此篇题名不确切，因其通论“王正月”，全不及“春”，当题名《王正月说》为宜。

12(17)王梓材、冯云濠辑：《宋元学案补遗》，载《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844页。

13(18)冯可辅修、杨泰亨纂：《光绪慈溪县志》，载《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972页。

14(36)胡安国：《春秋胡氏传》，载《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页。

15(43)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2524 页。

16(44) (45) (92)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2173、2173、2928 页。

17(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7) (78) (80) (81) (83) (85) (87) (89) (90)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444、190、444、13、399、395、408~409、405、405、357、457、277、279、282、280、279、283、404、279、1 页。

18(91) (93) (94) (95) (96)黄宗羲原注、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882、2913、2588、2596、2594 页。